



嫁给革命的中国

[德] 王安娜 著 李良健 李希贤 校译



IS16.
14

1516.55
14



嫁给革命的中国

[德] 王安娜 著 李良健 李希贤 校译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0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嫁给革命的中国/(德)王安娜著;李良健,李希贤校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9
ISBN 978-7-108-03232-4

I. 嫁… II. ①王…②李…③李… III. 回忆录—德国—
现代 IV. I516.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14090 号

责任编辑 黄 华

装帧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26.75

字 数 321 千字

印 数 0,001—8,000 册

定 价 39.00 元

出版说明

本书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西德友好人士王安娜（安娜利泽博士）所著的一本回忆录。

王安娜 1907 年生于德国，曾在柏林大学攻读历史和语言，并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从 1931 年起，她积极参加了反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运动，为此曾两次被捕入狱。1935 年，她和一位在德国从事革命活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婚，1936 年 2 月来中国。此后，她在中国度过了漫长的 20 个春秋。30 年代和 40 年代是中国民主革命极其艰苦的年代，中国人民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了浴血奋战。在这个时期里，王安娜作为一名为正义事业而不倦战斗的战士，和中国人民同患难，共命运，在抗日大后方辛勤地工作，付出了很大的精力。新中国成立后，她又为增进中、德两国人民的友谊继续作出贡献。1955 年，她离开中国返回东德，1961 年移居西德至今。

本书所叙述的，是作者在中国的前 10 年的亲身经历和见闻观感。书中对这个时期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各方面人物和事件，对中

国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对国民党统治的腐败黑暗和人民大众的苦难生活，以及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进行的英勇斗争，都有不少介绍和描写。了解这些，对于每一个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来说，将会是有益的。

本书初版于1964年，再版于1973年。1978年，香港曾根据本书日译本出版过中译本。现在的这个译本是根据德文原著1973年新版，参照已有的中译本，校译而成的。书中注释，均为校译者所加。

这不是一本系统的历史著作，而是个人的回忆录。书中涉及大量的人和事，又是作者在事隔二三十年之后追记的，因此，书中某些叙述难免与事实有出入，我们难以一一作详尽校正，请读者阅读时注意。

本书出版过程中得到了有关同志和单位的热情支持，这里一并表示谢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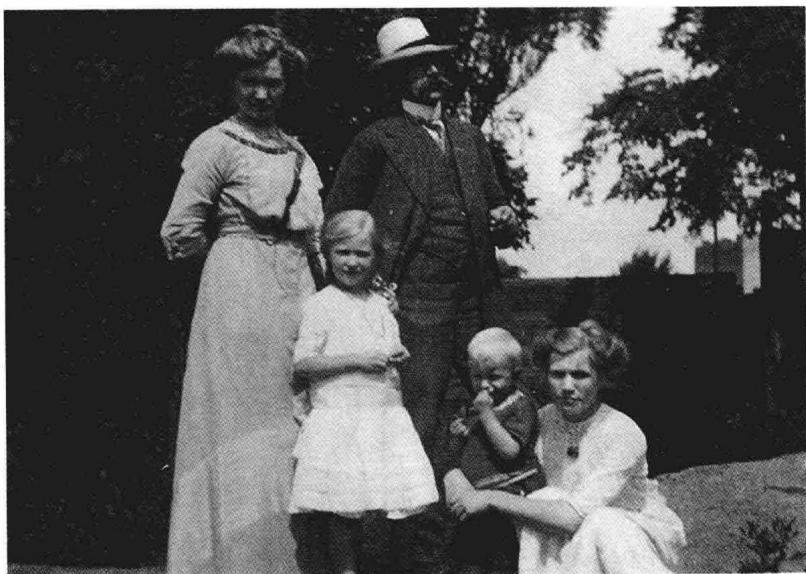
三联书店编辑部

1980年1月

中译本再版前言

无论从中国人还是德国人的角度来看，我母亲王安娜都是一位极不平凡的传奇人物。

她 1907 年出生于当时德国西普鲁士的一户普通农民家里，从小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她酷爱读书，追求真理。由于她聪明过人，二十几岁就拿到了哲学博士。上世纪 30 年代初，希特勒以他的花言巧语迷惑了多少德国人而登上了领导人的宝座，没用多久就把德国拖入了一场世界灾难。我母亲却非常特殊，她就是和许多周围的同辈人和亲戚朋友不一样，早早地就看穿了纳粹一伙人的嘴脸。在刚大学毕业就起来参加一些反法西斯小组，口诛笔伐揭穿纳粹的阴险用心，为此她曾两次被纳粹秘密警察逮捕拘留。在这期间她认识了正在德国留学并组织抗日活动的中国共产党人王炳南，共同的信念使情投意合的他们结合在一起，不久他们就在英国伦敦结了婚。1935 年末，当父亲王炳南得知组织上需要他回国参加抗日重要活动时，就立刻和母亲一起动身离开了柏林，很快就来到了到处动乱、苦难深重的中国。



幼年王安娜和母亲（左一）、父亲、弟弟、姨妈

王安娜来中国后并不是以一个外国旁观者的身份消极地置身事外，做一位洋夫人，相夫教子。她早就知道王炳南是个抗日的革命者，作为一位革命者的妻子，她应该和丈夫一起并肩战斗。随后，她立刻和她丈夫一起，投入了如火如荼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新中国的战斗洪流之中。最初来到 20 世纪初落后的大西北，对她来说，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她开始学说中国话，学中文，习惯中国的生活。她知道，要想了解中国的现状，要与各方面人士深入交流，又不被别人蒙蔽，必须要掌握中文。在她的努力下，熟悉中国的必修课程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取得了成效。在以后 20 年的漫长岁月里，她像一个地道的中国人一样，生活在他们之中，毫无隔阂地和他们进行交流，和他们同命运共呼吸。以致到她高龄以后，还能用地道的陕西腔与朋友对话，烧地道的四川红烧肉，吃辣子。



大学时代的王安娜

1936 年底，她不顾战乱中的恶劣条件，只身带着出生才两个月的我，千里迢迢来到刚刚发生西安事变后的西安，为的是亲自了解事变的第一手资料。随后，1937 年初她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在这里她清楚地认识到了只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才能救中国，这更进一步坚定了她和中国朋友一起积极投身抗日的决心。在以后漫长的抗日及解放战争年代，她都以一名信得过的党外朋友的身份，领受了周恩来先生和宋庆龄女士许多艰巨而重要的任务。

她在 1938 年 10 月日军攻占武汉前的日日夜夜里，为许多国际援助机构及通讯社写了大量介绍八路军军民抗击日军事迹的文章。她接受周恩来的委托，以八路军少校的名义调查了红十字会的工作情况。不久后，她又得到周恩来和宋庆龄的新委托，马不停蹄地跑到越南海防港口的海关，用她的智慧完成了艰巨的通关



在重庆时的王安娜（1940—1944 年）



在上海时的王安娜（1945—1955 年）

任务，使得大批珍贵的医疗和救济物资顺利、及时地输送到八路军的大后方去。1939 年秋，为了帮助宋庆龄了解白求恩大夫及其医院的工作情况以及对医疗器械的需要，她不顾生命危险，在八路军战士及地方武装的掩护下，穿过日本鬼子的封锁线，到达晋察冀边区，与白求恩大夫作了长谈，最后向宋庆龄提供了详尽的报告，圆满地完成了任务。1945 年抗战胜利后，她赴上海来到宋庆龄的身旁，为宋庆龄所创办的机构——保卫中国同盟及以后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经历了艰苦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建立了新中国六年之后，也就是在 1955 年，已年届 48 岁的王安娜没有停留下来享受革命果实，而是告别了留在中国的唯一的儿子和朋友们，只身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德国。离开中国之前，她对她的老朋友们和我说：“我可以在德国宣传中国，这比我在中国的作用更大些。”回德国之后她又面临着一个新的开始，她最初是在柏林洪堡



回德国后的王安娜



老年王安娜

大学讲授中国及亚洲史，并在其他大学作有关中国问题的讲座，而后开始写作并组织、参加许多介绍和了解中国的社会活动。

我母亲本来计划把她来华 20 年（1936—1955 年）在中国的种种经历写成两本书，第一本书记录她来华后到 1945 年抗战胜利前的那一段回忆，第二本书准备写后一段，即 1955 年回德国前的那一段经历，包括解放前在上海以及解放后在北京和上海为宋庆龄工作的那一段历史事实。我曾听她谈过打算写作的一些篇章，比如上海解放前赵朴初先生如何冒险帮助宋庆龄转移和存储给解放区的救援物资，史良女士如何以律师的身份开证明帮我们摆脱国民党保甲长的干扰，许多有关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活动，等等。由于种种原因，虽然做了许多准备工作，但是这本书可惜没有能够

问世。我母亲没有特别对此加以说明，我个人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这一段历史与宋庆龄及其所领导的机构关系非常密切，而孙夫人宋庆龄一贯不愿意披露她个人的隐私，不希望没得到她的允许来写有关她的文章。我母亲作为她的亲密朋友，自始至终得到她的完全信任，从1938年到1980年四十多年的交往中，我母亲保留了她近300封信件，可以说对她非常了解。因而当宋庆龄当时还健在的时候，母亲遵循了对一个密友的不成文的约定，宁可等以后与孙夫人磋商后来写这一段历史，而不是贸然来写。另一个是她健康状况方面的原因，眼疾和腿疾使得她后来动笔越来越困难了。

自王安娜这本回忆录的德文版出版后，立刻在德国各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当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还没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很少有人到过中国，报章杂志及电台所发表的有关中国的新闻和报道大都是过时的、片面的、非常陈旧的旧闻，以致许多德国人对中国非常不了解。许多德国朋友看过这本书或听过介绍这本书的讲座后，都纷纷来信或打电话反映他们的观感。除了对母亲的经历表示敬佩外，也表示了对新中国的了解有顿开茅塞之感，使德国和中国的距离缩短了许多。

母亲这本书的续集虽然没有写成，但是她利用各种场合宣传新中国的努力从来没有停下来过。她多次应德国各大电视台、广播电台及报章的邀请，介绍新中国的创建及最新发展的情况。她经常接到许多观众和听众的来信，感谢她为介绍新中国所作的努力，有的读者来信说：“通过阅读王安娜的这本书和听了她的宣讲，才对中国的过去和现在有了一个正确的了解，因而更加喜欢中国了。”在她最后担任德中友好协会名誉会长期间，走遍了許多德国的大城市，更加积极地介绍新中国的成就。她在毛主席、周

恩来、宋庆龄等人的追悼纪念集会上都作了热情而令人感动的发言，给德国朋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王安娜所写的这本书的德文版是在上世纪 70 年代初期出版的，书名为《我曾为毛战斗过》。随后有法文译本，再后来又有日文译本，书名叫《嫁给革命的中国》。香港广角镜出版社根据此译本翻译成中文。王安娜 1979 年应邀来华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请两位德文翻译家李良健、李希贤根据德文原版校译中文，书名改为《中国——我的第二故乡》。该译本文笔流畅且比较忠实于作者的原意。现在三联书店将此书再版，增加了四十多张珍贵的历史照片，都是首次发表；书名选用《嫁给革命的中国》。在此我要特别感谢他们所作的努力。虽然王安娜的这本书主要是为德国读者写的，但是它对我们中国读者，特别是年轻的读者来说仍然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如果通过这本书的再版能够让现在的中国青年人了解到一些他们的父辈及祖父辈为建立新中国进行艰苦奋斗的那一段历史，虽然是一个小小的侧面，我想，我母亲安娜的在天之灵一定会感到极大的欣慰。

王黎明

2009 年元月 20 日写于海南三亚

中译本著者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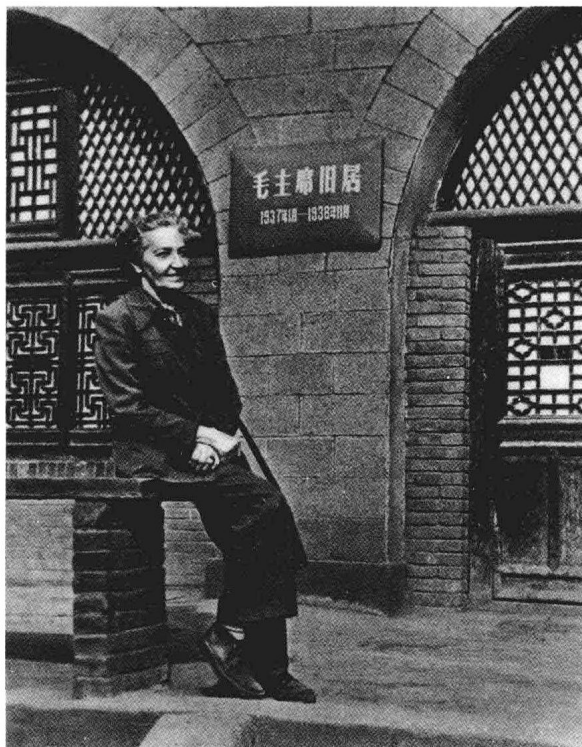
中国之行结束后，我为本书中译本写了这篇前言。在这次旅行中，我重访了我在多年以前曾生活过的城市。1936年至1945年，我在延安、西安和重庆亲身经历了对中国命运，从而也对世界历史产生根本影响的历史事件。

1937年初我在延安结识了中国革命的领导人；1979年5月，我在延安参观了毛主席、周总理和朱德元帅住过的窑洞，这些窑洞如今已成为博物馆了。新中国的基础就是在这里，自1937年至1947年奠定的。

今天，1979年，我重游延安。它不再是只有平房的小城市了，到处都是新建的多层楼房，一所拥有500个床位的大医院即将竣工。

1937年我在这里时，住的是一间窄小的房子，睡的是土炕，而今天我下榻的地方却是一家华丽的新式饭店。

宽阔的街道代替了昔日的羊肠小路，甚至去唐朝古塔也能乘汽车了，颇为方便。从宝塔山上眺望延安城及其周围的景色，使人心旷神怡。



王安娜在毛主席住过的窑洞前（1979年）

当年我们过延河，只能艰难地蹚水或骑马，如今延河上已架起了许多新式桥梁。

西安——1936年初至1937年我曾生活过的城市，也使我忆起了它的过去，看到了它的今天，展望了它的未来。我参观了杨虎城的公馆，当年我曾在这里住过数月，还参观了八路军办事处。西安对中国革命的发展也曾起过重要的推动作用。

话剧《西安事变》使我看到了以戏剧形式再现的1936年12月的历史事件。这部话剧不仅在艺术上引人入胜，而且对年轻一代有很大的教育意义。

同中国各地一样，西安城的面貌也焕然一新。这里出现了许多新的多层住宅、宽阔的街道和疗养区。过去西安只有为数不多的小工厂，如今在它的郊区，人们都能看到许多工厂建筑。

特别使我喜悦的，是那些数不尽的新栽植的树木和许多新建的公园。工作之余，各阶层居民都可以在这里休憩；而过去只有少数富豪才拥有供他们自己散心的私人花园。

当然，中国的变化不仅仅限于城市。我在西安近郊的一个人民公社里看到大量的使农业生产得以提高的灌溉设施。生产大队队长自豪地给我指着那一望无垠的麦田，精心管理的果园和菜园。绿油油的麦田，丰收在望。队长的自豪是有道理的。

我在一个农民家里做客，女主人热情地给我倒茶。屋内洁净，陈设虽然简单但很实用。和城市一样，这里也有电灯。屋里摆着一架缝纫机，这是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象征。

从西安到重庆我乘的是火车，这条铁路是解放后修建的。本书的读者会知道，当年我曾在这段路上旅行过，那时历尽艰辛，花了足足几个星期的时间。而今天，我坐在舒适的车厢里，欣赏着沿途秀丽的景色，仅一日的工夫便到达重庆了。

抗日战争期间我在重庆度过了六个春秋，重新与它见面，我的心情激动万分。在我的这本书里，我对这座城市在国民党统治下所呈现的那种使我至今仍记忆犹新的可怕情景作了描述。

我对这座城市是非常熟悉的，可是今天到了这里，我几乎迷失了方向。到处是新的街道，新的房屋，新的花草树木！“整个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我对陪同人员说，“人们不仅看到了今天，而且也已经看到了未来。”

在中国，年老的一代还知道那可怕的过去，记得苦难、压迫和剥削的刻度表，同时也记得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所进行的使



王安娜、王黎明参观西安事变 60 周年展览（1996 年）

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人民得到解放的英勇斗争，而中国的青年人则没有经过那些岁月。所以，应当让青年人也了解过去，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更好地认识今天，更加努力地为明天而工作。

因此，我欢迎本书中译本的出版，并且希望它在今天，在建设时期里，能有助于发扬老一辈革命者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里所深刻表现的那种战斗意志和牺牲精神。

Anna

1979 年 5 月 15 日于北京